

多重空间意识、意象判断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

杨思灵** 高会平***

【内容提要】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政治叙事的不断变化,近年来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日益引人注目,国际社会众多国家行为体和组织均对印度有着越来越高的期待,也使印度在多边舞台上的斡旋空间不断放大。客观来看,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行为选择受到多重空间意识,即领土空间意识、人口空间意识、文化空间意识、发展空间意识、荣誉空间意识、权力空间意识的规定,基于多重空间意识形成的对行为体的意象判断决定了印度在次地区、地区间层次、全球层次的多边主义战略投射。与此同时,基于多重空间意识与意象判断,依据印度对待多边合作组织的态度可将其参与或拒绝参与的多边合作组织分为六类,即主导控制型多边、引领塑造型多边、有限协调合作型多边、对冲博弈型多边、置冷遗弃型多边与全球改革型多边。印度多重空间意识的“边界缺失”造成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逻辑的悖论。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多边主义 多重空间意识 交互边界

DOI: 10.16608/j.cnki.nyyj.2024.04.02

近年来,印度日益成为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态势来看,印度期待通过积极参与、塑造多边主义引领印度的崛起已经成为重要议题。在此过程中,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偏好选择越来越明显,尤其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与中国周边安全新态势研究”(项目编号:23&ZD331)的阶段性成果。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 昆明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是加入了其此前一直在观望的由美国及欧洲国家主导的多个安全组织。有研究认为，印度在多边领域的活跃已经表明印度对外政策的制定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历来对联合国以外的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①那么印度真的改变了对参与多边主义的怀疑态度吗？关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行为动机，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视角。比如有学者从地位满意度的角度分析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行为，并认为印度建构了变革者、控制者和有限者的角色。^②有的学者则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认为印度在参与中印多边机制时始终坚持非合作博弈。^③本文试图提供另外一种认知及应对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视角。通过研究发现，基于多重空间意识所形成的意象判断是印度参与多边主义战略投射的重要变量，至于在多重空间意识中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国家行为体之间多重空间意识与意象判断的交互及边界尺度。

一、文献回顾

在多重空间外交领域，国内外学者从印度参与次地区多边、地区间多边、全球多边三个层次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一）参与次地区多边

在南亚次地区范围内，印度是众多次地区多边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甚至是一些次地区多边的发起者。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几个重点进行了研究。一是印度参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以下称南盟）多边。有学者认为，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是印度南盟政策制定和变化的核心动力。^④也有研究从霸权身份的视角，分析了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在相互认知上的失衡，导致南亚地区合作难以深入发展。^⑤二是印度与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以下称环印联盟）。有学者认为，环印联盟为加强区域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

① [澳]伊恩·霍尔：《莫迪与印度对外政策的“再造”》（孙西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4年版，第35页。

② 姜波：《地位满意度与印度的国际机制合作行为》，《国际展望》，2024年第4期，第125页。

③ 陈利君、卢森：《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56页。

④ 吴琳：《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与印度的南盟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52页。

⑤ 邱实、蔡立辉：《印度国家身份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基于国家身份认知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42页。

机遇，作为环印联盟的海上强国，印度在环印扩大地区影响方面既有优势也有劣势。^① 有学者注意到印度试图利用环印联盟增强其在环印度洋区域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② 三是萨伽学说（SAGAR doctrine）。^③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在萨伽框架下加强与印度洋国家合作有助于印度继续成为地区安全提供者。^④ 四是印度参与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有学者提出，印度推进“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的诉求在于通过渐进方式分阶段实现南盟一体化目标、服务于“邻国第一”政策，以重塑地区影响力、平衡国内地区发展与资源配置以及构建以印度为主导的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⑤ 五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有研究认为，BIMSTEC 面临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与冲突的风险，可能成为印度等大国制衡与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工具。^⑥ 在印度参与次地区多边的研究方面，学界已经注意到印度的角色以及挑战，不过对印度参与次地区多边的多边主义整体战略特征关注较少。

（二）参与地区间多边

印度参与的地区间多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等西方成员国为主的地区间多边，例如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印太经

① [印] 斯瓦兰·辛格、[印] 瑞妮·玛娃：《印度与环印联盟的经济关系》（刘鹏译），《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5~146页。

② 韦红、李次园：《环印度洋联盟的发展及中国的合作策略》，《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74页。

③ 萨伽最初是莫迪2015年3月在演讲中以倡议的形式提出的。2017年11月20日，印度外秘在出席一次活动时使用了“萨伽学说”（SAGAR doctrine）。此后，这一表述的使用出现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这种表述高频出现在印度外交部相关文献中；二是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使用这种表述，例如莫迪在2024年访问孟加拉国的演讲中就使用了该词；三是这种表述已经被用于正式的国与国的文件中，例如2024年6月22日发布的《印孟共同愿景：加强互联互通、商务合作，实现共同繁荣》。鉴于此，本文将这一表述翻译为“萨伽学说”，而非倡议、战略或者愿景，因为后三者印度官方几乎很少使用，这体现出印度想将这一概念更正式化或更正规化的考虑。

④ Soumyodeep Deb and Amlan Dutta, “India’s Role i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Measures for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Indian Ocean under SAGAR,” *The Journal of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Studies*, Vol. 10, No. 2, Summer/Fall 2003, p. 47.

⑤ 吴兆礼：《印度推进“孟不印尼”合作：诉求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70页。

⑥ 卢光盛、李江南：《地缘政治经济视角下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的发展及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第49页。

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等。有研究探讨了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限度，^① 有学者就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从古典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② 第二类是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成员的地区间多边，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俄印三边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有学者认为，金砖国家未来深入开展合作始终面临印度方面的制约与掣肘，若处理不好将对该机制未来发展产生较严重的负面影响。^③ 印度参与中俄印三边合作的动因与局限受到学者的关注。^④ 有研究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加入增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合作格局的复杂性。^⑤ 第三类是“中间地带”的地区间多边，尤其是印度参与东盟合作受到学者的重视，并涌现出较多的研究成果。^⑥ 客观来看，印度参与地区间多边的活跃度和积极性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关于印度参与地区间多边的变量研究仍然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三）参与全球性多边

在全球层次，印度参与多边的重点包括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与全球南方。在联合国方面，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全球治理、联合国外交等议题受到学者重视。有学者认为，印度参与联合国行动受树立大国形象、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维护海外经济利益以及保护海外侨民等国家利益驱使。^⑦ 有学者注意到印度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采取坚持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机制为中心，选择性参与全球治理。^⑧ 在

① 胡娟：《“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南亚研究》，2022年第3期，第24~41页。

② 刘思伟：《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进程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37~55页。

③ 王世达、徐琴：《印度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力、阻力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9期，第24~41页。

④ 王世达：《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参与中俄印三边合作的动因与局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59~71页。

⑤ 李孝天：《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地区定位与合作格局》，《国际展望》，2021年第3期，第96页。

⑥ 武香君、杨路：《印太视域下印度东南亚政策的再定位》，《国际论坛》，2024年第4期，第48~64页；许娟：《“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调整及影响》，《南亚研究》，2024年第1期，第81~104页。

⑦ 时宏远、周培佩：《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因、作用及挑战》，《南亚研究》，2023年第4期，第58页。

⑧ 杨胜兰：《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模式与限度》，《学术探索》，2020年第6期，第63页。

对联合国外交上，有学者指出，印度经历从积极到消极，再从消极到谨慎的转变。^① 在参与 G20 方面，有学者认为，G20 对印度以经济增长和发挥国际事务影响力为支柱的大国外交战略意义更加突出。^② 在参与全球南方议题上，印度试图主导全球南方的发展方向，塑造自身的全球南方品牌，而且有学者注意到了印度参与全球南方的这一趋向。^③

从现有的研究看，印度参与多边的重点方向、议题、驱动、局限、层次均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对印度参与多边外交的整体性规律以及系统性认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多重空间意识的角度，分析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多重空间意识变量以及形成特征。

二、分析框架：多重空间意识、意象判断与交互边界

当今的世界依然是国家的时代，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陆地空间都被一个或几个国家声称拥有主权。^④ 换言之，地球由各个不同的国家地理空间所构成。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及地缘经济学均是基于地理空间形成的理论，无论是“心脏地带”论还是“边缘地带”论都是理论家们建议霸权国家依据地理空间的特性追求支配权或者防止别的国家获取支配权的理论。国家空间由内部空间与外向空间所构成，内部空间关系到国家民族、身份、关系的整合，外向空间则是基于地理空间决定处理与其他国家行为体的时空坐标。地缘政治经济学只有结合了时间与空间才有意义，比如技术在时间里发展，在空间中运用。没有技术的成熟，“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再如何重要也是空中楼阁，而技术的发展需要时间。

国家行为体也依据本国空间特性来确定对外战略及其政策的时空坐标，而国家利益则是确定对外战略及其政策时空坐标的空间特性。有学者提出，

① 李丽：《印度的联合国外交：态度变化、议题变迁以及评价》，《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6期，第43页。

② 李杨：《印度对 G20 的定位、立场与参与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9期，第192页。

③ 张立、辛逸伦：《莫迪政府的“全球南方”外交转向》，《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4期，第77~95页；张杰：《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全球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91~109页。

④ Sami Moision *et al.* ,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the State: Themes, Challenges and Futures,” in Sami Moision *et al.* eds., *Handbook on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the State: New Spaces of Geopolit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0).

国家利益由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所构成,^①这当然是合理的,但仍然可以进一步细化,发掘国家定位时空坐标的各个维度的空间,比如一个国家行为体内个别人在国外受辱或被歧视,很有可能会被视为对该行为体整个族群的歧视,从而引发国际政治互动的激烈动荡。按照现有的国家利益分类似乎难以对应。而此种行为的发生已经极大影响到该国家行为体的时空坐标调整。众所周知,尽管有例外,一般而言,人口、领土、政府、外交承认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基本条件。^②那么一个国家的空间特性就与这些基本条件紧密相关。领土空间和人口空间显然是根本,除此之外,领土与人口在时空内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影响政府中的政治精英的行为方式与偏好。在现实政治中,发展构成了政治精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构成了与其他行为体进行持久竞争的基础。与此同时,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国家的权力和荣誉均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因此,一个国家行为体的空间特性至少由领土、人口、文化、发展、荣誉、权力等空间构成,就此而言,每个国家行为体都有自己的多重空间意识。虽然绝大多数的国家行为体总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组成,但表现在国家行为层面会有一个整体的国家行为体多重空间意识,由这个多重空间意识所形成的意象判断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而这种意象判断通常由执政的政治精英所完成。

(一) 多重空间意识

一是领土空间意识。领土空间与安全紧密相关,领土的规模、地理位置、我者与他者的立场深刻影响着领土空间意识的生成,是国家行为体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二是人口空间意识。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同样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政策选项,人口空间流动通常伴随着交融、竞争、冲突、战争的人类历史。三是文化空间意识。文化构成国家行为体的精神内核,体现国家行为体的精神面貌。民族国家通常关心自身文化空间的深度与广度,关心是否能够成为其他行为体的学习榜样。四是发展空间意识。发展成绩往往构成政治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如何处理我者与他者的合作关系就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空间意识。五是荣誉空间意识。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有“国格”,类似于人格,高度重视我者的国格是否被尊重。六是权力空间意识。在国际政治的

^①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② [美]卡伦·明斯特、[美]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五版)(潘忠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权力游戏中，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权力位置并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

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并非简单平行关系，领土空间与人口空间是其他空间的基础与前提，文化空间、发展空间、荣誉空间、权力空间均依托于领土空间和人口空间而存在、发展和演化。从客观事实来看，任何单一的空间意识交互都有可能引起一个行为体对外战略的变化，也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领土空间的冲突与碰撞就关系到人口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变动，关系到发展空间、国家荣誉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动。多重空间内部呈体系关系，虽然可能有优先顺序，但是多重空间共同规定了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国格”，即多重空间共同规定了国家的气质、行为与对外政策选择。

（二）意象生成与判断

国家行为体的多重空间意识最终汇聚为三种心理情绪与活动。

第一，恐惧。这种情绪在六重空间都存在。在领土空间领域，对国家安全、个人安全的恐惧无时不在；在人口空间领域，人口的变动对国家有着生死存亡的意义，同样让政治家们倍感焦虑；在文化空间领域，恐惧于文化传统被侵蚀，他者文化的长驱直入；在发展空间领域，恐惧于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或者在与他者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在荣誉空间领域，恐惧于他者的诋毁；在权力空间领域，恐惧于失去支配权或被他人所支配。

第二，心理渴望与期待。与恐惧相对应，国家行为体的渴望与期待“有迹可循”，同样对应多重空间。渴望国家绝对的安全，渴望权力的不断扩大并得到其他行为体的认可，渴望人口空间不断拓展，渴望文化空间影响不断增强，渴望外部世界的尊重。在渴望与期待中，被长期殖民的部分东方国家长期存在一种悲情主义情绪与焦虑，极度的自卑与极度的自傲情绪相互交织，有非常急迫而强烈要证明自己并得到外部世界认可与尊重的冲动，一旦外部世界的空间反馈与预期不符合，具有这种情绪的国家就犹如“刺猬”做出不断升级的系列反应，甚至出现极端极化的现象。

第三，意象判断。意象被定义为认知的构建，也就是形势在头脑中的反映，其中包括决策者对其他行为体的认识。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和迈克尔·菲斯克勒（Michael P. Fischkeller）提出了一种基于五种不同战略认识的意象理论：敌人意象、退化意象、殖民意象、帝

国主义意象以及盟友意象。^① 玛尔塔·科塔姆 (Martha L. Cottam) 则根据美国的经验提出了敌对国家、霸权国、敌对国家的依附性盟友、中立国、盟友、美国的依附国以及傀儡等七类意象。^② 意象判断可以简化为三个层次的心理认知: 一是对自身的意象认知, 二是对互动行为体的意象认知, 三是对第三方行为体的意象认知, 包括单个国家行为体、地区组织、国际组织等。意象有着刻板的特征, 正如有人指出, 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决策团体通常对敌人有一种简单化、模式化的认识, 对自己固有的伦理道德则抱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③

(三) 交互边界

基于多重空间意识形成的意象判断贯穿于行为体空间交互之中, 空间交互的边界尺度影响多重空间互动的性质以及效果。国际关系多重空间意识交互边界大致有五类, 即协议边界、心理边界、行为边界、叙事边界与尊重边界。行为体之间的协议能否得到遵守关系到互动关系是否呈良性互动, 心理边界与国家的空间特性存在认知上的差异, 比如在心理上印度倾向于认为中印争议地区都属于印度, 形成了中印战略关系发生改变的原始冲动。对外行为是否遵循理性与克制的原则决定了国家关系变化的性质, 在行为体叙事之中, 是否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我者”与“他者”也影响着行为体交互的前景。如果不顾客观事实扭曲抹黑“他者”的形象, 行为体互动就很难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基础, 中美关系的症结正源于此。也许在其他多种边界都难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情况下, 如果互动行为体能够做到相互基本的尊重, 比如“求同存异”, 行为体之间的空间交互也可能有一定潜力。

客观来看, 交互边界的缺失是当前国际政治的普遍现实, 即协议违约、心理偏颇、行为越界、叙事自利、缺少尊重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互动中越来越突出。需要指出的是, 多重空间交互边界的缺失不仅存在于敌对、竞争行为体之间, 同样也存在于亲密盟友伙伴之间。敌对行为体之间的空间互

^① [美] 詹姆斯·多尔蒂、[美]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年版, 第626~627页。

^② [美] 詹姆斯·多尔蒂、[美]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第628~629页。

^③ [美] 詹姆斯·多尔蒂、[美]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第633页。

动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与长期积淀的恶意有关,^① 因为处于敌对关系尤其是在领土空间意识存在冲突,那么几乎不可能存在换位思考的空间,对彼此的意象认知以负面形象为主,采取的反应与举动也是相互伤害式的螺旋上升,不管如何试探,彼此之间的伤害都是长期存在的,有时候为显性,有时候为隐性,比如巴以持续的冲突。在合作伙伴关系中,“边界缺失”同样影响深远。在空间互动中,即使是在对发展空间的认知上,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优先级也存在差异,由此造成的错误与不信任就会产生,而不信任一经产生,合作的确定性就会受到威胁。例如2018年马尔代夫新上任总统萨利赫以“债务陷阱”为借口违背了中马双方达成的合作协议、联合声明以及共识,实际上既出现了心理上的偏颇也违背了边界协议精神,导致中马合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盟伙伴之间的互动同样受多重空间交互边界缺失的困扰。美日联盟虽然名义为同盟,但美国几乎不会真正尊重日本的利益诉求。迄今为止,日本在坚挺美日同盟的同时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并应对美国所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伤害,比如美国军人在日本驻地的胡作非为。叔本华曾经悲观地指出,这个世界总体上来说都是沉浸在困境之中的:野蛮人互相吞食,文明人则互相欺骗,这就是现实世界运行的规律。^② 尽管这种观点过于极端,但多重空间交互边界的缺失确实制约着国家关系的互动。

三、多重空间意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行为变量

客观来看,印度参与多边主义既受多重空间认知的驱动,也受多重空间认知的制约。因此,要深入认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驱动逻辑,需要首先理解印度“我者”的多重空间意识。

第一,印度的领土空间意识。尽管在印度的古代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大一统”,但近代被殖民的经历却给印度留下一个广阔领土的想象空间,至今依然在影响印度对外行为。在海洋空间方面,英国殖民时期将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变为“英国的内湖”的辉煌依然在影响印度的行为,

^① [荷]曼弗雷德·凯茨·弗里斯:《刺猬效应:打造高绩效团队的秘诀》(丁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② [德]阿图尔·叔本华:《人生的智慧》(余荃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187页。

使其认为印度洋乃是“印度之洋”，^①有印度学者就提出印度洋向来是印度的后花园。^②所以在海洋空间方面，美国也曾被印度视为外来者并采取排斥的态度。不过，随着印太地缘政治图景发生变化，印度追求印度洋影响力的手段从自助转向他助，选择与拥有印度洋控制权的美国合作以制衡中国。^③在陆地边界方面，印度拒绝合理的领土空间调整，在中印边境一线依然贯彻英国殖民时期的“前进政策”，不断寻找有利时机拓展其实际控制的地理边界。在巴基斯坦方向上，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依然深刻地制约双边关系的发展。总体来看，印度存在着实际的地理空间、争议的地理空间与心理上的地理空间意识，在这样的领土空间意识里，印度既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愿意接受合理的解决方案，结果就是难以避免对国家关系互动造成冲击与影响。

第二，印度的人口空间意识。印度的人口空间极其复杂，其国内分布着为数众多的族群，有2000~4000个重要的身份符号，是印度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基础。^④海外印度人分布较广，有承认印度政府的群体，也有反对印度政府的群体，对海外印度人的不同态度影响着印度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众多族群构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制约了印度对多边主义的参与效率。在目前的印度人口空间意识中，三个方向受到特别的重视。一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学者判断：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取代世俗主义成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对印度的对外政策取向产生影响。^⑤二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印度穆斯林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三是海外印度人。莫迪时代的印度与此前极为不同的一点就是特别重视人口空间中海外印度人的作用。与当地印度侨民进行交流几乎成为莫迪出访期间一个常规的重要议程，表明印度试图利用其人口空间的特性重塑印度的形象。2024年7月，莫迪在维也纳对印裔的演讲中描

① [澳] 大卫·布鲁斯特：《印度之洋：印度谋求地区领导权的真相》（杜幼康、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② [印] 雷嘉·莫汉：《中印海洋大战略》（朱宪超、张玉梅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③ 朱翠萍、胡文远：《印度莫迪政府印度洋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与战略限度》，《南亚研究》，2024年第2期，第52页。

④ 张家栋：《印度族群政治透视》，《世界知识》，2015年第23期，第32页。

⑤ 王世达：《作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影响》，《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6期，第28页。

绘了“巴拉特”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不断追问听众感觉如何。^①

第三，印度的文化空间意识。印度古代文化灿烂，吠陀经典的传世、《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部史诗的影响、印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传、佛教对东亚的影响等都是证据。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印度文化的连续性却受到挑战，包括伊斯兰教的冲击、英国殖民的解构都使印度文化出现没落迹象。尼赫鲁承认：“一个受着外族统治的国家，因逃避现实而梦想已经消失的时代，并企图在幻想过去的伟绩中求得安慰，这实在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耽迷的愚蠢而又危险的消遣法。在印度还有一种认为我们在世界上虽在其他方面降低了地位而在精神上仍不失为伟大的想法，也是同样有问题的。”^② 尽管现在印度已经不再受外族统治，但当前的印度政府正在竭力从古代的“伟绩”中发掘灵感，重塑印度的文化空间。有研究者注意到印度莫迪政府有意打造印度“软实力”，利用印度的文化传统和遗产影响地区和世界，^③ 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将印度变成“世界导师”，^④ 这一信念正是来自对印度古代文化及其宗教遗产的信心。

第四，印度的发展空间意识。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印度长期受到诟病，比如长期的低增长率、污秽的露天厕所、漂浮着杂物的恒河等。不过，在莫迪执政期间，印度的发展合作空间迅速拓展，比如升级“东向政策”为“东向行动政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呼应美日提出印度的印太愿景，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然而事实表明，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同时，印度也对此非常警惕和怀疑。例如，印度在倡导区域一体化和积极融入各种合作组织的同时，其关税水平仍居高不下；在不断“东进”的同时，却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第五，印度的荣誉空间意识。近代被英国殖民的历史给印度的荣誉空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疤痕，也使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伤害，耻辱感一直驱使印度的政治家们急于实现“有声有色”大国地位的愿景。尼赫鲁就宣称：“我们必须把过去几代中献媚和屈服于傲慢的外国政权所留下来的耻辱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M’s Address to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Vienna, Austria,” July 10, 2024. 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address-to-the-indian-community-in-vienna-austria/?tag_term=pmspeech&comment=disable

②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90页。

③ [澳] 伊恩·霍尔：《莫迪与印度对外政策的“再造”》（孙西辉译），第4页。

④ [澳] 伊恩·霍尔：《莫迪与印度对外政策的“再造”》（孙西辉译），第33页。

一扫而空。”^① 印度总理莫迪在维也纳对印裔社区演讲时强调，2014年其刚执政时印度经济世界排名第十位，今天已经达到世界第五位，不久的将来将进入世界前三位。^② 莫迪在演讲中描述着印度的发展业绩，反复问听众对今天巴拉特的感受，其渴望获得认可和赞誉的心情溢于言表。苏杰生在日本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讲时列举了印度取得的成绩并强调：“我为什么要向您讲述这些？因为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日本来说，了解印度正在发生的变化规模和强度非常重要。”^③

第六，印度的权力空间意识。印度的权力空间意识深受英国殖民经历的影响，既承受了被殖民的痛苦，又受到权力榜样的鼓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言论^④无疑是建立在这样的矛盾经历之上的。从脱离殖民到成为世界大国的光谱中，尼赫鲁深谋远虑，构思了大联邦设想。^⑤ 尼赫鲁宣称：“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⑥ 有学者注意到，自独立以来，印度就没有改变过追求大国权力的初心。^⑦ 总体来看，印度权力空间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南亚以及北印度洋地区。这一层次构成印度权力空间意识的基础，历来受到印度的高度重视，尤其在海洋权力方向，印度洋对印度的重要性从未被低估。第二个层次是“印太”。印太地缘政治图景的出现使印度发现：在有关印度参与亚太地缘权力的叙事中可以使其从边缘成为中心。有学者认为，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不仅是提升印度大国地位的政策选择，

①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57页。

②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M’s Address to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Vienna, Austria”.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Opening Remarks by EAM, Dr. S. Jaishankar at the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 July 29,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8045/Opening_remarks_by_EAM_Dr_S_Jaishankar_at_the_Japan_National_Press_Club

④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57页。

⑤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711页。

⑥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第712页。

⑦ 宋德星：《大国权势：印度外交战略的不改初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期，第19页。

而且印度正在利用这样的机制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①在这一层次，印度的权力目标是竞争、平衡权力。第三个层次是全球。即尼赫鲁所描述的“有声有色的大国”。在这一层次，印度谋求的是全球性权力，用印度政治精英的话说，印度不仅是世界“民主之母”，还是“世界导师”。

四、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基于空间意象判断

从多重空间意识的角度观察，对地区多边组织的领导型国家或组织的意象判断构成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重要依据。印度多重空间意识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和系统，受其影响并形成的意象会投射到各种多边机制，影响着各个多边组织的发展性质、效能与限度。

（一）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中的行为体意象判断

国家行为体依然是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的核心要素，一个国家行为体对其他国家行为体的空间意象判断就构成了其参与多边策略、进行战略投射的重要依据。从印度参与的次区域多边组织、地区间多边组织以及全球性多边组织的状况来看，巴基斯坦、其他南亚国家及印度洋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部分欧洲国家在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此形成的意象判断影响着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选择与战略投射。关于对中国的意象，除了20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中中国有着复杂的标签，且以负面为主。^②在领土空间范围内，印度认定中国是“入侵者”。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莫迪总理在联合记者会上发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境“入侵”印度的言论。^③在人口空间领域，在印度人口空间与中国的人口空间交互中，尽管互为邻国，但中印都不是双方精英人口迁移的理想地。在文化空间领域，尽管双方拥有历史联系，但当前的文化价值观差异较大，印度一般认为民主是其优势。从发展空间来看，印度存在把中国看作伙伴和竞争者的矛盾现象，但视中国为竞争者是主线。印度为了自证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不惜

^① 刘思伟：《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进程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37页。

^② 杨思灵：《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第21~52页。

^③ [澳]伊恩·霍尔：《莫迪与印度对外政策的“再造”》（孙西辉译），第33页。

抹黑中国的发展模式，比如炒作“一带一路”倡议“债务陷阱”论。在荣誉空间领域，印度认为中国不尊重印度所取得的成绩。例如，有印度人认为，中国的非洲专家否认中印在非洲存在竞争，并认为将印度与中国比较是对中国的侮辱。^① 在权力空间领域，印度认为中国不认可其在次地区的权力，同时还在国际上反对印度“入常”，而且印度一些媒体时常报道中国阻止印度“入常”的消息。^②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对美国的意象判断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在特殊的冷战时期背景下，印美曾经分属不同的阵营，美巴同盟曾经使印度对美国充满了怀疑。但自 21 世纪以来，美国逐渐成为印度领土空间意识的支持者。在人口空间领域，印度对美国的意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支持分裂印度的势力，印度策划在美国的暗杀活动引发了双边关系的动荡。另一方面，美国也是印度人移民的理想地。据统计，近年来印度流向美国的非法移民大幅度增长，2018/2019 年度仅 8027 人，2022/2023 年度增加到 96917 人。^③ 在文化空间领域，印度虽然接受了西方植入的民主价值观，但是自认为文化传统要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要优越，要做“民主之母”和“世界导师”，印度试图与美国、欧洲国家在软实力的话语权上进行争夺。在发展空间领域，印度日渐将美国视为合作伙伴，重视和接受来自美国的投资，认识到美国技术与资金对印度的重要性。例如当印度联邦院议员质询“特斯拉和其他美国跨国公司是否正在考虑在印度建厂”时，印度外交部历数了莫迪访问美国时特斯拉等美国公司对印度的投资承诺。^④ 在荣誉空间领域，美国对印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地位都表现出一定的认可，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印度也意识到美国并不尊重印度，比如人权问题。在权力空间领域，美国认可印度的地区地位，并希望印度能够利用这样的地位充当好制衡者的角色。在印度与美国官方的会谈和声明中，美国都表明会

① Rajiv Bhatia, *India-Africa Relations: Changing Horizon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23), p. 195.

② 周宏刚：《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 2014 年博士论文，第 59 页。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Question No-1354 Illegal Migration to the US,” December 14, 2023. https://www.mea.gov.in/rajya-sabha.htm?dtl/37420/QUESTION_NO1354_ILLEGAL_MIGRATION_TO_THE_US=

④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Question No-80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the US,” July 20, 2023. https://www.mea.gov.in/rajya-sabha.htm?dtl/36837/QUESTION_NO80_PRIME_MINISTERS_VISIT_TO_THE_US=

支持印度“入常”并公开声称支持印度成为“全球领导型大国”。^①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对日英法德等的意象判断与美国类似，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对印政策上追随美国。当然也有差别，比如在批评印度人权问题上，日本与美国保持着距离。在印度的眼中，日本是印度争取大国地位身份象征的“志同道合者”。对于英国，印度感情复杂，殖民历史留下的耻辱，使印度急于向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证明自己的优越。因此，一旦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不尊重印度的荣誉空间，表现出不尊重印度的姿态，立即就会招来印度的激烈批评。例如英国试图为英印自贸协定的谈判设置最后期限，印度对此警告说不要试图用枪指着印度的脑袋。^② 法国已经被印度视为印度洋合作的重要伙伴，印法澳三边合作的形成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与日本一样，是印度追求大国身份象征道路上的重要伙伴。在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中，俄罗斯的地位较为超然，冷战时期苏联与印度曾经是“盟友”，现在与俄罗斯也是特殊伙伴，更是平衡中国的重要力量。

在南亚及北印度洋次地区，印度对他者的意象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与巴基斯坦有关。巴基斯坦不仅曾经是印度地区权力的有力竞争者，理论上未来也有这样的可能，而且认定巴基斯坦是支持、包庇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例如莫迪不仅声称“窝藏恐怖分子的行为必须受到强烈谴责”，还声称上海合作组织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③ 显然，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意象属于敌人范畴。第二部分是次地区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体量小，有的国家与印度关系密切，印度总的认定是这些国家与印度拥有特殊的关系，有着自身的发展与合作渊源，但印度亦高度警惕次地区的这些国家。印度联邦院议员就“人道主义援助斯里兰卡”问题质询印度外交部时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心：尽管印度在各方面向斯里兰卡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① Gaurav Kumar, "The Changing Trajectory of the Indo-US Relations," in Roshan Khanijo and Anurag Tripathi eds., *India and Its Emerging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Pvt Ltd, 2018), p. 83.

② 《印度警告英国：“不要拿枪指着我们的脑袋”》，澎湃新闻，2024年7月1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062304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Modi's Remarks at the Extended Format Meeting of the SCO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s," July 4,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7926/Prime_Minister_Shri_Narendra_Modis_remarks_at_the_extended_format_Meeting_of_the_SCO_Council_of_Heads_of_States

但据说在某些问题上斯里兰卡倾向于中国，这是否属实？^①

关于东盟，无论是在“东向行动政策”中还是在新的印太地缘政治场景中，印度均公开重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在印度意象判断中，东盟显然是印度扩大地区与国际影响力最重要的舞台。印度的东进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尤其印度能够与东盟迅速达成多种机制性安排，这与东盟对印度的期待紧密相关。

（二）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

第一，印度参与次区域多边合作的策略选择与战略投射。根据印度的多重空间意识以及意象判断，在参与次地区多边主义时，印度采取了如下战略投射。

一是在次区域内排除竞争者，打击潜在的“背叛者”。尽管巴基斯坦与印度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但从空间意识来看，巴基斯坦在印度领土空间意识、人口空间意识、文化空间意识、发展空间意识、荣誉空间意识与权力空间意识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在领土空间领域，双方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依然是难解的死结；在人口空间领域，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印度却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在文化空间领域，印度教文化的崛起对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势所难免；在发展空间领域，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一些合作让印度充满怀疑，甚至焦虑，在国际社会宣扬巴基斯坦的一些合作项目损害了印度的主权；从荣誉空间来看，印度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被学习的榜样；从权力空间来看，印度不允许巴基斯坦挑战其在次地区的地位，因此尽最大可能孤立巴基斯坦就成为其多边战略的重要选择。例如，不愿意支持有巴基斯坦参与的南盟的合作与发展，使巴基斯坦难以在多边框架下对其构成挑战。同时，推动次地区不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多个区域组织的发展。在打击所谓的“背叛者”方面，印度主要采取封锁、干涉的策略。例如2014年尼泊尔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谅解备忘录，2015年印度对尼泊尔实施长达数月的石油禁运，原因就在于印度担心尼泊尔偏向中国。

二是防止次区域多边组织的外向性合作，使这些多边组织围绕印度内向转圈。南盟最为典型。有学者指出，印度破坏南盟制度进程和忽视地区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Question No-391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Sri Lanka, July 25, 2024. https://www.mea.gov.in/rajya-sabha.htm?dtl/38001/QUESTION_NO391_HUMANITARIAN_ASSISTANCE_TO_SRI_LANKA

功能合作的“反常”行为对霸权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① 如果从多重空间交互理论来审视印度阻碍南盟发展进程就能够清楚地理解印度的行为并非反常举动。有学者主张中国与南盟推进经贸合作,^② 但这个合作前提并不存在,即使南盟能够成为与东盟比肩的地区组织,在印度的多重空间意识中,中国与其有边界争端,甚至视中国为“入侵者”、文化影响力和发展模式的竞争者、次区域地位的威胁者(包围者)、在荣誉及权力上最不能满足印度需求的国家。因此,中国与南盟的合作难以照搬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模式。其他印度参与的次地区组织也同样如此,例如 BIMSTEC。

三是拒绝有可能会影响印度主导的次地区合作组织。最典型的案例有两个,一个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另一个是中尼印经济走廊。尽管有研究表明,孟中印缅区域的贸易潜力巨大,^③ 且早在 2013 年时就已经写进《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④ 然而印度拒绝推进孟中印缅实质性合作,采取非合作博弈的态度。^⑤ 在中国提出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不过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合作策略。以上两个案例表明,印度不合作的逻辑显然是担心中国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努力可能影响到印度的南亚及北印度洋势力范围。

第二,印度参与地区间多边合作的战略投射。

一是全面深度地参与由美欧主导的多边组织,实施融入战略,不再遵循刻意与西方保持距离的传统。自 2014 年以来,印度参与的由欧美主导(以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居多)的多边组织几乎占据了其新参与或新发起的多边组织的 50%,其中包括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海牙行为准则(Hague Code of Conduct)、瓦森纳协定(Wassenaar Arrangement)、澳大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印度—北欧峰会(India-Nordic Summits)、印法澳三

① 吴琳:《地区霸权的制度护持与印度的南盟政策》,第 52 页。

② 张军、王荣博:《“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中国与南盟经贸发展的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18 年第 7 期,第 21~27 页。

③ 王领、陈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亚太经济》,2019 年第 4 期,第 47 页。

④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13 年 10 月 23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20/1207_677232/201310/t20131023_8008749.shtml

⑤ 陈利君、卢森:《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第 56 页。

边合作 (India-France-Australia Trilateral Cooperation)、印以阿美领导人峰会 (I2U2)、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in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阿尔忒弥斯协定 (Artemis Accords)、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 (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气候农业创新使命 (Agriculture Innovation Mission for Climate) 以及联合海上力量 (Combined Maritime Forces) 等。对于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倾向,有学者认为,疫情暴发以来的印度大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一系列调整,在印太方向上推进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准同盟,在经济布局上推动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并重塑产业链方向,在价值观上则与美国拉近距离。^①

二是印度通过不断发起多边合作组织,塑造自身引领者的地位,打造印度地区领导者形象。2014年以来,印度新发起或参与发起多个多边组织,包括全球河流城市联盟 (Global River Cities Alliance)、全球绿色信贷倡议 (Global Green Credit Initiative)、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 (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全球生物燃料联盟 (Global Biofuel Alliance)、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 (International Big Cat Alliance)、全球南方之声峰会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生活方式促进环保运动 (Mission LiFE)、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三边合作、印太经济框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2U2、印法澳三边合作、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 (领导人峰会)、产业转型领导集团 (Leadership Group on Industry Transition)、抗灾基础设施联盟 (Coalition for Disaster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印度—北欧峰会以及国际太阳能联盟 (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 等。

三是在参与中国、俄罗斯引领的多边组织方面主要发挥“平衡者”的作用,合作意愿不断下降。在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后印度并没有采取正向举措推动该组织的发展,更多关心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影响印度的利益。再次是希望平衡中俄在该组织的影响力,例如一直在竭力推动英语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官方语言。印度领导人甚至不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活动,莫迪总理未参加2024年7月在俄罗斯举办的上

^① 林民旺:《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第31页。

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只是派外长苏杰生参加并代为发言。^①

第三，印度参与全球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在次地区、地区间层次印度都可以采取抛弃、拒绝、新创等手段实现自己参与多边合作的意图，但在全球层面，印度并没有力量完全主导一个全新的全球性多边组织，只能在原有的全球框架内来推进印度的意图，这也决定了印度只能采取推动“改革”的态度来对待全球性多边。当前印度主要在联合国、G20、全球南方等多边舞台推动战略投射。

2018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改革的多边主义，旨在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核心，目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主要任务是对多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宣称要传递出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②印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推动多边主义的改革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跻身全球领导者的行列。^③与此同时，在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硬指标的同时，印度也在具有全球多边性质的舞台上主动作为（如G20和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以发挥印度的软实力影响，希望能够塑造印度事实上的全球领导者形象。基于印度的多重空间意识，印度明显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不管是人口规模还是领土面积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又或者被外界所看好的发展潜力以及英属印度曾经的“辉煌”，这些都增加了印度追求成为世界大国的心理期待。

印度参与全球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主要包括如下取向。一是积极争取各个行为体对其追求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不管是在次地区多边舞台、地区间多边舞台，还是全球性的舞台以及双边互动中，寻求其他国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例如，印度希望上海合作组织能够在支持印度“入常”问题上达成共识，莫迪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共同致力于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只有当这些努力扩展到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时这才有可能，我们希望在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Modi’s Remarks at the Extended Format Meeting of the SCO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s,” July 4,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7926/Prime_Minister_Shri_Narendra_Modis_remarks_at_the_extended_format_Meeting_of_the_SCO_Council_of_Heads_of_States

② 张甲英、赵彦云：《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影响》，《国际论坛》，2023年第4期，第3页。

③ 同上注。

久的将来能够就前进的道路达成强有力的共识”。^① 在面对非洲国家时，印度主张印度与非洲应当在推进联合国改革方面合作以改变全球秩序，因为这既符合印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② 当前，印度也获得了部分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开支持。2024年莫迪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向印度重申坚定支持印度成为改革后和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③ 美国、日本、德国和巴西均在不同场合表明了支持的态度。

二是争取发展中国家对其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身份的支持，凸显印度的贡献，塑造印度领导者形象。在联合国领域，印度以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议题创设多边组织，比如抗灾基础设施联盟。该联盟已经从最开始的12个成员发展到目前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成员。^④ 该联盟声称是为了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从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来看并不限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蒙古、古巴、塔吉克斯坦等都是该联盟成员。印度总统在斐济议会演讲时声称，印度还在一些国际气候行动平台上发挥了带头作用，印度真诚感谢斐济对其中许多倡议的热情支持，包括国际太阳能联盟、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和韧性岛国基础设施（IRIS）。^⑤ 抗灾基础设施联盟章程声称联盟将成为韧性基础设施方面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全球交流中心，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⑥ 同时，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在章程中确认了印度的主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Modi’s Remarks at the Extended Format Meeting of the SCO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s”.

^②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Africa Partnership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Prioritie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Remarks by Secretary (ER) at ICWA National Conference,” September 3, 2019.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1785/IndiaAfrica_Partnership_in_a_Changing_Global_Order_Priorities_Prospects_and_Challenges_Remarks_by_Secretary_ER_at_ICWA_National_Conference_September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oint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22nd India-Russia Annual Summit,” July 9, 2024.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7940/Joint_Statement_following_the_22nd_IndiaRussia_Annual_Summit

^④ “Members,” CDRI. <https://www.cdri.world/members>

^⑤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ddress by President at the Parliament of Fiji,” August 6,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8155/Address_by_President_at_the_Parliament_of_Fiji_August_06_2024

^⑥ CDRI, 《抗灾基础设施联盟章程》，第3页。 https://www.cdri.world/upload/pages/CDRI_Charter_October-2019_Chinese.pdf

导地位，规定印度应担任理事会常任联席主席。^①随着成员的不断增长，抗灾基础设施联盟已经成为印度凝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支持的一个重要舞台。在G20框架下，印度发起了类似的行动，比如发起全球生物燃料联盟，并游说发展中国家加入该联盟。印度总统在访问斐济时表示，希望斐济尽快正式加入全球生物燃料联盟。^②最能代表印度试图打造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案例是其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成功邀请非洲联盟加入G20。莫迪在G7峰会上表示，“印度认为有责任将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和关切问题搬上世界舞台。在这些努力中，我们高度重视非洲。我们感到自豪的是，G20集团在印度的主持下，使非洲联盟成为常任理事国。印度一直在为所有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与安全做出贡献，并将继续这样做。”^③

（三）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基于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产生的意象判断以及战略投射，根据印度对待各类多边主义组织的态度大致可以将其参与或拒绝参与的这些多边组织划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主导控制型多边。这一类型无论在领土空间、人口空间、文化空间，还是在发展空间、荣誉空间以及权力空间的交互方面均比较紧密，是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基本盘。此类型的代表性组织包括南盟、BIMSTEC、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等。在这一类多边合作中，印度软硬兼施，主导或阻碍着这些多边合作组织的进程。在这一层次，印度的多重空间意识是复杂的，既有安全的焦虑，也有满足地区国家利益诉求的负担，又深惧次地区国家的背叛可能影响印度的地区地位。

第二类是引领塑造型多边。该类型多边既包括次区域多边，也包括地区间多边，同时还包括全球性多边，多由印度发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抗灾基础设施联盟、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等。在这些多边机制中，印度成功地纳入其提出的规范或者理念，较为成

① CDRI,《抗灾基础设施联盟章程》，第5页。

②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ddress by President at the Parliament of Fiji”.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Modi’s Address at the Outreach Session of the G7 Summit,” June 14,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7874/English_translation_of_Prime_Minister_Shri_Narendra_Modis_address_at_the_Outreach_Session_of_the_G7_Summit

功地吸引了部分国家跟随。比如印度在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中提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债务问题，其提出的可持续、绿色信贷等均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印度参与此类多边的积极性最高，既不用在安全上有心理负担，同时又能彰显印度的领导者形象。

第三类是有限协调合作型多边。该类型主要包括金砖国家峰会、印太经济框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金砖国家峰会能够给印度带来实实在在的荣誉与经济利益，印度拥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一方面，印度精英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机构中担当要职，另一方面，印度可以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印太经济框架固然有其地缘政治目的，但是印度显然希望能够通过印太经济框架重塑地区产业链，使印度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不过，印度参与此类多边属于有限合作。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狭隘的国家安全观以及对美关系优先将是印度参与金砖合作的阻力。^① 印度同时也是印太经济框架的发起成员之一，不过囿于发展空间的制约，印度具有特殊地位，即印度不参加印太经济框架的第一支柱贸易。尽管印度现今没有加入 RCEP，但在 RCEP 谈判阶段，印度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只是因为印度认为 RCEP 没有满足印度发展空间的需求才选择退出该多边合作框架，但不排除未来印度选择回归或者回归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四类是对冲博弈型多边。印度参与的该类型组织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上。尽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引领成员都是俄罗斯与中国，但印度对这两个多边组织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在对待金砖峰会时，印度主动引领和塑造金砖国家合作议程，例如支持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② 然而对待上海合作组织，印度的表态则是批评性的。例如在 2024 年 5 月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中，印度暗示上海合作组织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是非现代化且需要改革的组织。^③ 实际上，印度几乎没有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提出有益的合作倡议及方案，主要源于印度的心理期待是制衡巴基斯坦、平衡中国，防止中俄过于靠近而损害印度的地位与利

① 王世达、徐琴：《印度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力、阻力及前景》，第 35～36 页。

② 王世达、徐琴：《印度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动力、阻力及前景》，第 27 页。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Remarks by Secretary (ER) at the Meeting of the SCO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May 24, 2024.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7825/Remarks_by_Secretary_ER_at_the_Meeting_of_the_SCO_Council_of_Foreign_Ministers_Astana_May_21_2024

益。在印度舆论看来,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是“破坏者”的形象。^①关于印度对中俄关系的敏感,印度联邦议员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2024年莫迪总理访问俄罗斯时,印度联邦院议员向印度外交部质询“印度与俄罗斯共同合作与支持的领域中是否涉及中国的作用与参与,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回答称不涉及第三方。”^②从印度联邦院议员对这个问题的质询可以看出,印度存在较为根深蒂固的博弈思维。

第五类是置冷遗弃型多边。基于多重空间意识及意象判断,印度参与的一些多边合作组织或是被搁置,或是被放弃。前者的主要代表组织是南盟,其实没有巴基斯坦参与的南盟已经使南盟失去了本身应有的地区含义,要重启该组织就必须重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印度就必须调整其多重空间意识中的巴基斯坦意象判断。从当前的趋势来看,印度要调整的可能性很小。印度遗弃或者拒绝参加的多边组织中典型的例子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印尼经济走廊。这些多边合作都曾经出现在印度与相关国家互动的官方声明中,但印度始终没有启动这些多边合作。正如有学者提出:如果一个国家将另一个国家视为高度敌意国家,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不会在具体问题上让步。由于对方的要求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即便是最微小的让步都被视为不理智行为。^③

第六类是全球改革型多边。该类型多边组织包括联合国、G20、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等。印度政治精英竭力宣传印度正在崛起,印度领导人声称印度是“民主之母”,还是“世界导师”。在维也纳面向印裔的演讲中,莫迪强调的其实是印度的经济崛起是在其带领下实现的。莫迪不仅确立了印度到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届时世界将成为“发达巴拉特”的世纪,而且声称“我们正在为巴拉特未来1000年奠定坚实的基础”。^④也有学者认为印度崛起的大国战略轮廓日渐清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现代化

① 周宏刚:《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第59页。

②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Question No-393 Outcomes of Prime Minister’s Recent Visit to Russia,” July 25, 2024. https://www.mea.gov.in/rajya-sabha.htm?dtl/37999/QUESTION_NO393_OUTCOMES_OF_PRIME_MINISTERS_RECENT_VISIT_TO_RUSSIA

③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④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M’s Address to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Vienna, Austria”.

的新印度、印太地缘政治图景、多向结盟构成了其大国崛起战略的基本内容。^①但是客观来看，在全球性多边层面，印度依然没有资源和能力去实施在次地区、地区间层面的多边主义策略，其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只能以较低姿态寻求广泛的合作以实现目标。

结 语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的“边界缺失”造成了印度参与多边主义逻辑的悖论，印度一方面试图通过参与多边主义实现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却采取有悖于地区主义整合与发展的战略。

一是在次地区领域有意愿推动地区主义的发展，但同时排斥巴基斯坦以及用施压手段对付其他次地区国家，必然引发这些国家对印度多重空间意识的警惕并给予回应。最近南亚国家发起的“印度退出运动”，主要就是因为印度多重空间意识“跨界”所造成的，尤其是过度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将南亚其他国家看作其“后院”，干涉南亚其他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的合作。

二是在其多重空间意识中有意愿与中国进行战略调适，并积极参与中印共同参与的多边机制，但同时将中国固化为“入侵者”“竞争者”和“破坏者”，在参与多边主义合作的过程中进行取舍。这对印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印度长期在多边组织中持消极态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印度是否真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印度在联合国推行改革能够取得成功。

三是印度主张对外开放与合作，却在多重空间意识中过于强调所谓的自身敏感。南亚、印度洋国家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要考虑印度的敏感，区域外国家与次地区国家合作也要求考虑印度的敏感，这几乎难以做到。关键不在于此类合作内容是否敏感，而在于印度霸权思维“制造”敏感，进而引起多重空间交互连锁反应，这不仅影响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投射，也最终影响印度参与多边主义的成效。

印度多重空间意识有极端利己的特性，重塑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也几乎

^① 李莉：《印度大国崛起战略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2期，第19页。

不可能，但深入认识印度多重空间意识及意象判断可为应对印度参与多边主义、促进印度对华战略调适提供重要参考。例如，在荣誉空间领域，可以部分地探寻满足中印彼此心理需求与期待的内容；在权力空间领域，在叙事上相互承认彼此的地区领导性贡献；在发展空间领域，落实中印两国领导人共识，相互认可彼此崛起叙事；在人口空间领域，改变相邻却不相通现状；在文化空间领域，发掘历史联系等有可能缓和两国对彼此的意象判断，增加印度对参与中国加入的多边主义组织的兴趣与期待，为中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最为关键的领土空间领域，鉴于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以及意象判断的固化难以改变，中国需要耐心、决心与战略毅力。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坚定不移能够使两国关系处于正常状态，退让妥协反而会使对方期望更多的退让妥协，因而导致极高的长远代价。^①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0月中印在争议地区达成了军事脱离接触的解决方案，双方在领土空间交互上暂时回归“协议边界”精神。如果良好趋势能够持续，将有利于中印双方在多边主义领域内互动，印度对华空间意识以及意象判断也会有所调整，然而鉴于印度多重空间意识以及意象判断尤其是对华意象判断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并不能排除印度再次违背“协议边界”的可能性。

(编辑 毛悦)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102页。

Abstracts

The Shaping of State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and the Logic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By Hu Xiaowen

ABSTRACT: There ar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of state identity. Foreign policy reflects both a state's "self" and its position vis-à-vis "others". Changes in foreign policy reflect adjustmen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state identity both at home and vis-à-vis external actors. India has long sought a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that does not reflect its actual level of state power, and its foreign policy reflects India's desired identity as a state. Since independence, India's foreign policy has responded to the construction, correction, and reshaping of both its internal and outward facing identit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India's state identity has undergone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to self" during the Nehru era, to the divergence of "self" and the crisis of "other" during the Indira period, and culminating in the reshaping of its identity during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period. These identity changes have driven Indian leaders to adopt different views on country's national interests, prompting continuous 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factors provide a lucid explanation for changes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offer a long-term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the deep-rooted causes of shifts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State identity; Indian Foreign Policy; Self and Other; Changing and Reshaping Identity; Secularism

Multi-layered Spatial Awareness, Imagery Judgement and India's Strategic Projection of Multilateralism

By Yang Siling & Gao Huipi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its economic power and corresponding evolution of its political narratives, India's behavio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heightened expectations of India, expanding the space within which it can maneuver within

multilateral forums. Objectively speaking, India's choices regarding multilateralism are shaped by multiple layers of spatial awareness, including considerations relevant to territorial, demographic, cultural, developmental and honor factors, as well as related to power. The imagery judgment formed from this multi-layered spatial awareness determines India's strategic projection in multilateral platforms at the sub-reg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is multi-layered awareness and imagery judgment, India exhibits six attitudes toward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dominant leadership, guiding and shaping, limited coordination, counterbalancing and competition, withdrawal and abandonment, and global reform. The "boundary deficiency" in India's varied spatial awareness results in a paradox in its projection with multilateralism.

KEY WORDS: China; India; Multilateralism; Varied Spatial Awareness; Interactive Boundary

**India's Evolving Views of Indo-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Insights from Social Identity Theory**

By Zhu Yuwen

ABSTRACT: Since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Indo-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improved, with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They have conducted joint exercises across land, sea, and air and embarked on joint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n new fields. According to social identity theory, India's perception of Indo-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has progressed through three stages: social categorizati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identity formation. Today,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shaped 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arding Indo-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Japan is seen by India as a strategic partner sharing common democratic values and security interests, while China is perceived as a competitor vis-à-vis India'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In the future, Indo-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threate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China's periphery, and posing challenges to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KEY WORDS: Indo-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Perception; Security Cooperati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